

历史文献的记载和比较

藏军洞一说起于明末,据说有一个叫冯一蛟的人写了一本《闲园志遗》,其中记载了此事。今人讲说藏军洞皆源于此书。此书今佚,未见原文是如何记载的。今所见记载则始于吴玉搢(1698—1773)《山阳志遗》卷一,原文如下:

新城东门城下旧有地洞,周环丈余,深不可测,上有横木遮之,俗呼藏军洞。相传建城时造,直达柳浦湾,去城三十里,不知所用。万历末,菊花沟农人挑沟,忽见砖壁,以为水淤砖桥也。毁之,得砖若干,建太平庵于其处。因取砖无尽,始知为此洞,惧而填之,今不知其处。

从此段记载可知,仅是一个地洞,藏军洞只是“俗称”,即人们口头传说而已,更无书本资料的佐证。直截了当称之为“藏军洞”的是《乾隆淮安府志》。其书卷 28《古迹》云:

藏军洞,在新城东门楼下,有地洞深不可量,乃创城时建。事见邑人冯一蛟《闲园志遗》。到了《光绪淮安府志》卷 37《古迹》仅有一句话:“藏军洞,在新城东门外。”《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 19《古迹》则又比较详细一点:“藏军洞,在新城东门外。《闲园志遗》云:“新城东门楼下有地洞,深不可量,周环丈余,乃创城时建。从地下直达柳浦湾,去城三十里。万历末年,农人浚菊花沟,见砖壁,毁之不穷。即地上量度之,直至新城东门下。始知为藏军洞也。至今尚存。”

仔细比较一下,同治县志所载有溢出《山阳志遗》的内容,比如“即地上量度之,直至新城东门下”一句即是《志遗》所没有的。又说“新城东门”楼下有地洞”,比《志遗》“城下旧有地洞”更精确。前者是说当时的事,无须表示时间的词语,后者说的是以前的事,故有一个“旧”字。行文中直接冠以“《闲园志遗》云”字样,比文末加注“事见邑人冯一蛟《闲园志遗》”,给人以更接近原文的印象。末尾说“至今尚存”,而《志遗》则云“今不知其处”。“至今尚存”是冯一蛟本人在《闲园志遗》中说的,说明在明末清初时还是可以看到的。又过了几十年,到了乾隆年间吴玉搢著书时便“今不知其处”了,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有理由相信,同治县志编者没有人亦云亦云随便抄录,而是使用了原书,其内容是直接从该书抄录出来的。又《志遗》中有一句“有横木遮之”,是同治县志所没有的。他既不能看到遗迹,这句话只能是从别的书中抄来的。如此说可信,则到了同治年间还能看到《闲园志遗》的原本或抄本。此书中可能还有其他更具价值的史料,对我们研究藏军洞和其他问题有所帮助,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此书了。此外,民国初年卢福臻的《咏淮纪略》卷下,也有歌咏藏军洞的诗。诗前小序先录同治《山阳县志》的记载,后加按语云:“邑志,新城创于元末,张士诚将史文炳守淮安,始筑土城。明洪武十年,指挥时高,取宝应废城砖石筑之。永乐二十一年,用工部言,土城低薄,令军士增筑,门上建楼云。”他是想说明这个地洞即藏军洞的建造时间。既然说是“创城时建”,他即据县志告知人们:城是元末建的,城楼则是元末或是明初永乐年间建的。当然,这仅是卢氏的个人意见。

冯一蛟其人

上引《山阳志遗》和淮安地方志所载,都说是源自《闲园志遗》,《山阳志遗》虽未说出于何处,但读其文字与地方志所载相类似,也应当源自《闲园志遗》。《闲园志遗》为明末清初淮安人冯一蛟所著,则此说即为冯氏所云。因为他是藏军洞的首先“披露”者,所以我们应当对他有所了解。《乾隆淮安府志》卷 22《人物》中有冯一蛟的传:

冯一蛟,字仲雨,山阳人,邑诸生。明季流寇残破中原,凤鹤震惊,淮安岌岌不保,蛟负经济才,当事要与议城守、措粮餉、借兵、截漕诸大政,蛟条划详备,皆见施行。甲申四月,淮安议团义兵为守御计,当事欲结人心,给漕赈数十万石。事小定,即追呼奄至,人心汹汹。蛟急上书史阁部可法,为淮民请命,遂得豁免,邑人德之。诸条议书启具载所著《间园十二书》中。年八十九卒。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 12也有他的传记,内容大致相同。乾隆府志卷 5《城池》又称其为“处士”,可知他是个未曾做过官的人;《山阳志遗》卷 4说他号“闲园”;《续编山阳诗征》又说他另号“漫叟”“嘘云”。此皆可作为对他身世材料的补充。他是明代诸生,查《淮山肄雅录》中并无其名,仅有一位叫冯一鹤,是万历四十年(1612)的诸生,可能是其族人。《淮山肄雅录》所载起自万历四十年,故冯一蛟成为诸生的时间,当在万历四十年以前。设若他于 20 岁时成为诸生,至明朝灭亡的 1644 年,他已五十多岁了。那样的年纪还能帮助官府为地方做事,也是很难能可贵的。但他很长寿,活了 89 岁,则当卒于康熙年间。他是一个对淮安地方很有贡献的人,《乾隆淮安府志》中,除了有他的传记之外,还有不少关于他的言行的记载。如卷 31《辨讹·天衢门辨》中,提及冯氏对于三城地理、河道极为熟悉,卷 5《城池》中提到他建议漕抚朱大典引活水绕三城。《山阳志遗》卷 4说他“与当事议城守、措粮餉、借兵截漕,条划精详。”都被采纳并“见诸实用”。《乾隆淮安府志》卷 30《艺文·淮人书目》记载,冯一蛟著有《闲园十二书》,《闲园志遗》未见列入。前者大约皆是向官府的上书,对治理地方极为有用之书,所以受到重视而被收入。后者可能皆是地方遗闻佚事,或者当时未能刻印出来,所以府志失载。

对文献记载的试解读

综合以上记载,以《山阳志遗》和同治县志二种最详细,但内容互有异同,可作互补。将二者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

发现地点:乾隆府志说“在新城东门楼下”,光绪府志、同治县志皆说在“新城东门外”,同治县志且说“即地上量度之,直至新城东门下。”我想问题并不矛盾。可以作这样解释:洞口在新城东门以内,由洞口处从地下向东可延伸城门外,但总体上来说,它是在新城东门城楼下面。所以“东门外”“东门楼下”“直至新城东门下”三说都没错。

外观:是一个地洞,洞口有横木遮盖。

洞口大小:“周环丈余,深不可测”。建造时间:同治志袭用转引的《闲园志遗》的话,明确说“乃创城时建”,可见冯氏说得很肯定,但未提供根据;吴玉搢是学者,他未见到旁证,持谨慎态度,所以志遗中用上了“相传”二字。

通往何处:同治志说“直达柳浦湾,去城三十里”。在《志遗》中也有这句话,是在“相传建城时造”之后,因而此句亦在“相传”之列,吴玉搢并未确定通往何处和有多远。

发现时间:是“万历末”。这个时间对冯一蛟来说,正他年轻的时候。

发现起因:当时是“菊花沟(即润河)农人

文 史

闲话藏军洞

刘怀玉



挑沟”忽见砖砌的墙,以为是一座被泥淤在地下的砖桥。人们就将砖头取出,在原地盖了一座太平庵。因为砖头老取不完,才知道是个地洞。

结果:参与此事的人害怕起来,就用土将它填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说,所谓藏军洞原来就是一个地洞,即一个地道。藏兵之说,本是一个推测,国史中无载,地方史中亦无旁证。卢福臻的诗是今见唯一歌咏它的诗。诗云:“行军上策贵藏军,暗设机谋弛敌氛。洞里伏兵三十里,一声叱咤壮风云。”诗人都有夸张的气质,但也增强了藏军洞的神秘性,激发了人们对藏军洞的大胆想象。所谓地下能“五马并行”,是今人的说法,更无历史记载,大约就是读了此诗以后想像的结果。而严谨的研究学问的学者却不予理睬,如以研究地方史著称的范以煦,他的《淮浦小记》和《淮流一勺》,段朝端的《茀·余话》等,都未提及此事。

河下也有地洞

在淮安地洞不只一处。吴进记载了乾隆年间发现另一个地洞,在河下相家湾东。吴进与吴玉搢是同族,算起来是吴玉搢的孙辈人。他在阅读《山阳志遗》关于地洞记载之后,接过话题说了一段话,连带说出他所见的这一个“地洞”:

地洞之说有之,乾隆三十四五年间(1769—1770),新城西门外相家湾居民修宅,掘地见洞,上下约五尺,洞首以石板遮盖。下洞,砖阶五层。洞周身砖砌,每去三五尺,壁有方穴,疑置灯者。深入里许,有土神祠,下泥淤垫,上滴水珠,人不敢深入。其长达何处,未之究也。仍用土掩其迹。由此观之,洞非一处,不知何用为此。

民国初年刻印《山阳志遗》时,将吴进的话附刻于相关文字之后,今人读刻本《山阳志遗》时即可看到。到了同治年间,程锺在他的《淮雨

从谈续编》卷下中,又记载河下的一个发现,他 also 称之为“地洞”:

河下相家湾街极东处,近钉铁巷口,有大宅,规制崇隆,盖数百年屋也。寇乱后赁居者少,房主亦惮于修葺。同治三年(1864)冬,售于拆户,于厅西偏掘得地洞,上如桥洞,下可容人行。阔五六尺,两旁砖壁,隔数尺有小洞,疑为置灯而设。东西两端则不知达何处地也。斯时里人观者甚多,或云:古人用以伏兵;或云:造以避寇;或疑似王侯墓前隧道,然俱不可考矣。

程锺在叙述完以后,又将上引吴玉搢、吴进的话全文抄录其后。但吴玉搢和吴进说的地点不同,吴玉搢说的在“新城东门”,吴进说的在“新城西门”。程锺在转录吴玉搢的话时,将“新城东门”也改为“新城西门”,产生了一个小小的差讹。《淮安河下志》卷十六《古跡》中,程锺的话及其附录的吴进的话,作了一字不落地全文转载,当然也带上了这个差讹。程锺又说“揖堂(吴进之字)先生此条叙述颇详,其所见洞,与今日所掘得者形制悉符,其中殆必有相通道耳。此亦里中古迹也。”

与程锺几乎同时代人李元庚也有所见闻,记载在他的《梓里待暇录》卷下,名之为“地道”:

二帝阁东,街南北俱有店铺及住房。其南有徐姓屋,因中落鬻于城内李氏。移建掘地,得地道。上盖石板,启视之,如深巷然。两旁粉壁,壁上壁洞,约置灯处。用火以绳系匠人腰,愈走愈远,数十丈未竟而回。其地已至姚氏宅中书房左右,即今游府署内。势若甚远,因仍封好。或云通下关,或云通刘伶台,未知确否。

吴进(1714—1793)、程锺(1824—1897)、李元庚(1892—1874)三人所说的地洞或地道,都在河下。吴进说的“新城西门外……相家湾”(同治县志卷 3 说,相家湾是从“新城西门外起,至窑沟头止,即古黄河堤也。”今估衣街是其东一段,是当年淮河大堤的堤顶),程锺说在“相家湾街极东处,近钉铁巷口”,李元庚说的“二帝阁东,街南……有徐姓屋”,都在估衣街东端,新城西门之西。这三者位置相近,几乎是在同一位置上。或许就是同一处。

从行文上看,他们都是目击者,所以洞里的情况记载得都很详细。比冯一蛟、吴玉搢记的详细多了。吴说他见的那洞“上下约五尺,洞首以石板遮盖。下洞,砖阶五层。洞周身砖砌,每去三五尺,壁有方穴,疑置灯者。深入里许,有土神祠,下泥淤垫,上滴水珠,人不敢深入。”程锺说他见的洞“上如桥洞,下可容人行。阔五六尺,两旁砖壁,隔数尺有小洞,疑为置灯而设。”他认为与吴进说的那洞“形制悉符”,并猜想两者之间“殆必有相通”的通道。李元庚说他见洞“上盖石板,启视之,如深巷然。两旁粉壁,壁上壁洞,约置灯处。用火以绳系匠人腰,愈走愈远,数十丈未竟而回。”从他们的记载来看,顶部有拱旋(桥洞)或石板,有五六尺宽,五尺深,隔一段壁上有放灯处,隔里把路还有一神祠,确实具备了地道的特征。当时有人传说“或云通下关,或云通刘伶台”,难怪他们猜测可能是“古人用以伏兵”;或者“造以避寇”,或疑为“似王侯墓前隧道”。但他们都未轻言之为藏军洞。大概一是无法确认,二是前人记载藏军洞在新城东门的缘故。然而礼部尚书李宗昉(1779—1846)的《山阳春赋》中有云:“满浦关

峙,藏军洞幽”。满浦是河下的古名,宋代有满浦坝,后曾有满浦驿。难道李大人认为河下地洞也是藏军洞?从材料学来说,河下地洞的材料比府县志上记载的靠谱得多,不知后来寻找藏军洞的人,为什么不试试从这条线索去找找。

当代人对藏军洞的找寻

如果说,前二者只有书证的话,最近的一个地洞或地道之说是有许多人直接目击的,它是现代人说的。《古代“藏兵洞”勘探开发项目书》中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拆山阳县学改建淮安大酒店挖地基时,“遇有一洞口,水不断溢出,抽之不尽,有好事者吕寿长,拄竹杖,打电筒,穿皮屐,趟入洞内,水齐胸部,目击洞顶砖墙,宽 4—5 米,状若镇淮楼下孔,往里隐约向东北弯去。”据说后来还请吕寿长再次下去寻找,但“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而没有找到。因为它处于漕运总督府旁,漕运总督握有兵权,手中有一部分军队的。于是便被与藏军洞联系起来。这里是政治军事中心,推想漕运总督或其他官府以这里为指挥部,军队可从地洞中向城外运兵。

寻找藏军洞是淮安人的一个情结。有人将藏军洞的情况编成连环画,发表在某画报上;也有人在各种报刊发表文章加以介绍。淮安历届党委和地方政府十分重视“藏兵洞”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悬赏,若能提供线索找到藏军洞者,奖励一辆凤凰自行车。当时人们生活水平低下,一辆自行车就是了不起的彩头了。又先后组织人员进行了三次找寻,前两次均因技术落后,手段原始,而告失败。2001 年 5 月,又曾邀请省地震工程研究所地球物理专家张治天、江苏省工程物理勘察院工程师周育仁率领工程技术人员,先后连续进行三次精密磁测,探地雷达勘察,并形成了《关于淮安市楚州区东部“藏兵洞”问题的初步调查及精密磁测探测报告》《淮安市古藏兵洞遗址探地雷达勘察报告》。报告书中说:“自季桥镇的大湾起向西经太平、三刘、干沟李、城东乡的高港直至淮城的下关、新城,地下有埋深 5—7 米、长达 30 多华里的地下构筑物。另根据探地雷达勘察,在原区体育场内、新村一区 60 号民房地下,均探有构筑物异常。”这里虽然只说是有“构筑物”,未明言是藏军洞,但与历史记载、民间传说的“藏兵洞”走向及其所在的位置基本相符。由于各种原因限制,当时未能找到,有待以后进一步挖掘考古。

附记:冯一蛟为明末清初人,或许《康熙淮安府志》中有点记载,可惜手头无此书,情况不明。

另外,有两点疑问,说出来请高明指教:

其一,中国历史上每遇南北分争,疆土分裂,多以淮河为界。淮安地处淮河之滨,一遇战事,往往都是军事前沿。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过许多战争。特别是两宋之交,发生过几次楚州保卫战。但至今未见到地道作战的记载,连一点暗示的线索也未有。若所说地洞真的是藏军洞,为何在历史上未留下一点痕迹?实在今人费解。

其二,淮安地处黄淮交汇之处,频年水灾。而且地下水位很高,平地深挖不用多深即可见水。如欲构筑地道,作藏兵之用,立即就会被渗透淹灌,无法使用。今人在避免防渗透漏方面还是比较困难,不知古人在没有水泥钢筋等材料的情况下,有何高超技艺建成几十里的藏军洞。

又:此稿撰于 2012 年春节前。后于区档案局读到《康熙淮安府志》,在《古迹》和《人物》中,都没有见到关于藏军洞和冯一蛟更多的资料。由此可知,至乾隆间藏军洞方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乃至于今。

疏浚淮水故道工程中的淮安医药队

田富生

导淮工程是民国年间国民政府筹划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疏浚淮水故道工程虽是导淮工程的一个部分,因有 12 个县共 16 万民夫参与,在当时,也可谓是一项了不起的公共事业。

民国二十一年(1932)春,淮安县导淮委员会筹备成立,提议淮安县中医药行业组织医药队为疏浚淮水故道工程的工夫服务。那时,淮安县中医中药业在苏北地区具有一定的优势,淮安县中医公会主席何樾岑、药业公会主席吕啸秋十分重视此项善举。他们积极筹划,经多次磋商,克服了动员医药人员、提供医疗药品的实际困难,最后落实淮安医药队由两个医疗小组组成,即由何樾岑、刘树农、吕啸秋、

孙亦农等 4 人,为第 1 组;由医师刘树荣、季丹初,药剂师任炳乾、章臣荣等 4 人,为第 2 组;并由淮安义生国药号采办国药。淮安工段在淮城东北的淮水故道董营迤周门段,距离淮城约百余里,均为阜宁县辖地。

民国二十三年(1934)10 月 22 日晨 6 时医药队第 1 组整队出发,“共载人力车 20 余辆,延长半里余,前导大旗两面,上书导淮工段淮安医药队,此举突破以往淮安中医药界参加公共事业之记录”。医药队人员到达阜宁芦蒲镇后即开始选点设诊疗所。

刘树农在结束第 1 阶段医疗服务,回淮时拟文,他这样说:

余等择工段适中地点之芦蒲镇为固定诊疗所,另组活动队,钱家码头、杨家码头、周门四处,逐日巡回诊疗。余等巡回各段,以周门就诊者为多,而渴望之忱,溢于辞色,缘该段工夫最多,工棚尚未齐备,栖风宿露,多染寒疾,至工段之工夫,则蜂屯蚁聚,绵亘数十里,胼手胝足,劳瘁将事,其伟大精神,实令人起敬,本队接值季丹初君及树荣堂弟,亦准时赴工,其任事之勇,至可嘉也,余等以规模已具接替有人,乃相率返淮。

淮安导淮医药队参与导淮工夫的医疗活动,受到地方新闻界的重视,各报竞相刊载淮安医药队的筹备、出发等消息。《苏北日报》“医声”专栏编辑沙亦恕的认知尤为具有深意。他说:

凡事有实干之精神,乃有良好之结果,中国医药事业,所以湮没不彰者,其缘由实基于守秘太深,而团结之力量不足也,惟其只知守秘,事业难期进展,惟其不能团结,外侮乃得纷乘,此医药事业前途遂不可问矣!淮安导淮医药队,谋工次病夫之健康,助导淮工程之进展,其实干精神,在风霜凛冽中奋斗,而争国医国药之地位,向之被人鄙视之国医,被人遗弃之国药,一跃而为光荣灿烂之国医国药,值得吾人欢欣鼓舞者矣!导淮工程,为国家一种最大建设,将来完成之后,裨益淮海各县农田,繁荣淮海各县市场,关系于人民生产事业,至重且巨,国医药参加导淮工夫疾病之治疗,直接谋工夫之福利,间接为国家作最大之贡献,其荣



誉一。国医药为国家高级机关向不重视,今既参加导淮,其转移政府目光,增进人民信仰,推销国产药物,巩固国医地位,可谓一举而数善备,其荣誉二。基上两点观察,则知诸君之行,定能为吾国医药界,放一异彩,吾人忝有言责,安能无辞?

刘树农(1895—1985)系淮城刘氏医家的 6 世传人。师从淮城大小方脉家应金台,精中医妇科、儿科;1928 年,担任淮安县中医医院秘书;1936 年受国民政府训练总监、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的邀请,为其治病,唐将军欲聘刘为私人医生。1939 年南京沦陷后,辗转多地,后定居上海,私人开业。新中国成立

后,先后担任某工厂的医药顾问,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静安分会副秘书长等职。1955 年受著名中医程门雪先生邀请参加整理历代医籍中有关沙虱致病理论和治疗文献资料。1956 年,被聘为上海中医学院教师。1978 年晋教授职称。之后,相继担任上海中医研究所顾问、上海中医进修班考试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中医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主任、中医理研究室主任。1980 年,带教第一批中医硕士研究生;1984 年,担任上海中医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有《刘树农医论选》等著述。

